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上

〔日〕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等 译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上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日〕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等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夫马进 古贺登 谷川道雄

尾形勇 岸本美绪 森正夫

策划

李济沧 蒋维崧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总序

谷川道雄

2004年10月下旬我首次访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有幸会晤了王兴康社长、赵昌平总编、蒋维崧编审以及其他诸位先生。当时我是应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的邀请,在该校逗留两周并进行授课和演讲的。因为那时正值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中译本(李济沧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才有了拜访该出版社的机缘。“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颇具规模的出版计划,正是由于那天的会谈而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是在那年7月从承担拙著编审的蒋维崧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出版计划的。信中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以拙著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范围,更广泛地向中国学界介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并希望我推荐一批能够代表日本研究水准的著作,尤其是能够选择那些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在10月的会谈中,出版社又出于同样的旨趣,要求我予以全面的合作。

想来这的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有关中国史研究的中日两国学界交流,已经有着长久的历史,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兴旺的趋势。交流不仅限于人员的交往,还以相互之间论文、著作翻译的形式对双方发生着影响。但是,这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便那些在日本学界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名著,几乎都没有中译本的出版。所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计划,不能不说是打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创举。就我个人而言,拙著中译本的刊行能够成为促成这一趋势的契机,更是倍感欣悦。出于如此的考虑,我也就不揣自陋地应允出版社,愿竭尽全

力协助此项计划的实施。

回到日本以后,我立即着手选定书目,其间还听取了我的同行、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先生的意见,最终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交了我的选目方案。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首批出版十种左右。

非常巧的是,这里所选的学术著作,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一过程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1868—1912)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形成期。当时,虽然兰克(L. Ranke)的弟子李司(L. Riess)受聘于东京大学讲授历史学,传授实证主义方法,但那毕竟是以欧洲史为基础的史学。在日本学者之中当时出现了与欧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对应,设立东洋史(即亚州史)分野的举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并且延续至今。这一情况一方面表明由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出现了必须重新认识东亚各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汉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已经出现了将中国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学问。最能够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而且影响至今的学者,即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一阶段正在孕育成形。众所周知,他的这一观点是切合中国社会实态的,是对中国史发展所进行的逻辑性解释。作为本丛书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就是出自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广博知识以及对历史发展透彻逻辑分析的力著。

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所谓的“战间期”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有着密切注重社会与民众的特点,中国史研究亦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及全世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也影响着日本的历史学界,作为具体的表现则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盛。而且,其中有着马克思主义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不可否定的。在我的先师、前辈的学者之中,有许多就是在这一时代新史学潮流中奠定了自身研究基础的,本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属于这一辈的人物。

然而,作为上述新倾向顶点的20世纪30年代,又正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当时,不但不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

式要求中国史研究者为战争提供合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那一严冬似的时代终告完结。由此也开始了中国史研究的第三阶段。

“二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是如何将中国史作为发展的中国史进行重建的问题。即必须纠正被军国主义歪曲了的中国史观,按照世界史普遍逻辑对中国史作出理解。当时对此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从战时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按照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将中国史系统化的尝试亦由此开始。为此日本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史的问题;另一个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构想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着长期、激烈的讨论,而且主要都是基于史料的实证观点之间的相互争论。其中虽说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毕竟应该说战后的中国史研究在当时有着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参加讨论的既有在上述第二阶段业有成绩的学者,也有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研究者。本丛书著者中,除了内藤湖南之外,都是为战后中国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的人物。

我在选择这套丛书的收录著作时,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的历史过程。然而,卓越的作品必定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所以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现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战后那二十几年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先学的著作在今天仍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不断启发着后生学者。

作为日本人,中国史既是一种外国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两千年来,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过去的日本在向中国的不断学习之中发展着自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以说也是由过去形成了结构,至今仍在其延长线上运行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着特别的亲近感,即尽管是外国史,但又有一半好像是在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感觉,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看待中国史的。其理由之一,也许就在于日本文化是在汉字文化

圈中培育成长形成的吧。无论如何,当这种感情作为近代历史学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和实证的结果,而将中国史总体按照世界史的普遍观点予以体系化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终极目标。

总之,也许可以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由传统与近代、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这样综合的视野重合展开形成的。当然,这种特点亦有其利弊两端。不过,本丛书所收著作都是肩负重任、不倦攀登的卓越成果。我坚信本丛书对今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之国际交流的发展必将有着巨大的贡献,并对将此计划付诸实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彪译)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上卷 概论编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的上卷《前言》第一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绝版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一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一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一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

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解。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绝版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

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踟躇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 1901 年 8 月 20 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一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 年 3 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 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一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对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 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 20 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

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一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一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

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 18 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 8 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 1963 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一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 1993 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一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 2015 年 3 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前 言

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定名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计划按顺序陆续出版发行。

在上卷的《概论编》中，收录了我出版较早、并且现在均已绝版了的单行本五种和短篇论文一种。自己当初设定的选书标准，正像该卷定名为《概论编》所显示的那样，尽量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专业性不是太强、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篇章。尽管如此，收录的各种书籍和论文，自有其不同的成书背景，因此又很难全部满足上述标准。

首先收录的是《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这个单行本原是羽田亨博士^①主编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②中的一种，也是我最早出版的单行本著作。我大正十四年(1925)^③大学毕业，这本书的出版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其间相隔约十五年。因此可以说，这个单行本总结了我这十五年间对东亚历史问题的一些研究心得；而书的出版，也得以使这十五年间的研究工作告了一个段落。然而，这个单行本毕竟是距今三十五年前的东西了，内容上有诸多不到之处，文章也显得稚拙，如今再次刊行，难免让人汗颜。然而反过来想，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迄今为止几

① 羽田亨(1882—1955)，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支那史学科，1909年任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后升任副教授。192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在北亚史、西域史、中亚史、敦煌学、东西交通史、民族学等各领域成果卓著，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下卷等。本书中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② 本译著中，原著叙述中出现的“支那”一词均改为“中国”，为保存必要的历史感觉，“二战”结束以前出版的图书论文，以及同时期的学科名称、学会名称等专有名词中的“支那”一词不改。

③ 原著中多用日本年号纪年，括注中的公元纪年为译者所加，以下不一一说明。

乎没有得到过学术界的认真讨论,很多观点就此被束之高阁,因此,今天看来,此书并非完全是无用之物。

参照古代希腊的社会发展阶段,将中国上古时期春秋前后的社会称为“都市国家”^①时期,这在日本恐怕是本书最早提出来的。此后虽经三十余年,直至今日,我更加确信这一提法并没有错。但是,在我国学术界中,赞成的人当然是少数。自己提出的这一观点几乎不被人们所接受,这对于我来说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人们不愿接受的理由,如果是因唯物主义史观无视或者轻视都市国家的存在所致,那么,不得不说这真是太无聊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只有能够更好地解释历史事实才有它存在的意义。以理论为中心,选择一些合乎理论的史实来证实或充实理论,若以此为能事,这就不是历史学了;同时,理论也就不称之为理论了。如果都这么做,不就陷入唯物史观的观念论之中了吗?

至于站在西方史学的立场上,从都市国家的定义出发,认为如果满足不了这个定义中的种种条件就不能称之为都市国家,对于这种原则性的批评,同样也无法首肯。说实话,这样的定义,即使是在都市国家最典型的古代希腊,恐怕也难以成立,谁也未曾论证、也无从论证曾经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无数的都市国家,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完全合乎都市国家的定义。事实上,能够详尽到如此程度的历史学在这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批评,不得不说是过度崇拜西方文化的弊端所致。

除此之外,本书在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理解中,还对“春秋五霸”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春秋五霸”,我认为是异民族在华夏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这一场起因于异民族的强国之间的争霸,到了战国时期变得更加炽盛,甚至在楚汉之争中都可以寻觅到它的影子。经过堪称古代帝国的汉王朝四百年的统治,各民族之间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同文同种的民族意识。

从三国开始,中国进入了中世纪,新的对立在汉人和北方各族群之间

① “都市国家”是宫崎市定对古代希腊 polis 的翻译,我国学术界通常译成“城邦国家”。“都市国家”是宫崎市定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为免产生歧义,本译著将与之性格相似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城邦国家径译为“都市国家”,而将欧洲历史上的 polis 译作“城邦国家”。

兴起,欧洲中世纪呈现出来的那种民族大迁徙,在中国也发生了。异民族不断侵入中国内地,并在中国内地定居、同化。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我注意到,异民族对中国文化的憧憬是非常强烈的,而固守自己民族传统习俗的意识却很淡薄。在社会经济方面,构成这一时期历史特征的均田制,其本质与此前政府按一定标准向农民授田,培植小农经济,将重农政策推向极致的神话般的理想主义土地分配制度不同,它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因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而导致的土地集中的社会问题,所谓的“均田”,实质上只能是天子庄园中的土地。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直持续到唐代,因而,将唐帝国视作中世纪国家是非常贴切的,在国家性质上,唐帝国与在上古都市国家的残骸——乡亭集体基础上形成的汉帝国大不相同。基于这一认识,对那些将汉唐视为前后相承的古代帝国的学说,我是无法赞成的。唐帝国的弱点也正在于其具有中世纪的时代特征,因此大唐盛世不会长久。唐中期以后,由于军阀割据愈演愈烈,国家分裂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最终迎来了五代十国的对立局面,中世纪也随之告终。

将宋朝以后视为中国的近世社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内藤湖南博士以来的传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出发,这一学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动摇的。从社会层面上来说,中世纪的门阀贵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近世社会特征的读书人,即士大夫构成了国家的统治阶层。读书人即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朝廷的官员录用制度即科举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举制源于隋朝,进入唐朝以后日渐兴盛。科举出身者的势力日益加强,以至于结成党派与门阀贵族争势夺利。进入宋代以后,贵族势力彻底衰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独占了朝廷的显要地位,成为政界和官场上的核心力量。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交通运输的大动脉,这也是进入宋代以后才完成的。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几乎完全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以至于各地的很多物产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商品经济发展同步的是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也是中世纪见不到的现象。宋朝政府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倾全力增铸铜钱,扩

大货币的流通量。中国近世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在这种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农村,他们是大地主;在城市,他们是大资本家。他们以财力为基础,教育子弟,使其科举及第,从而进入仕途,获得官僚的地位。

平定五代诸国、统一中国的宋王朝,不得不再次承受与北方民族对立的命运。从此以后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北方民族——辽、金、蒙古,民族变了,但势力却越来越强。进入近世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与中国对立的北方民族,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与此前相比,宋朝以后崛起的北方民族最具特征性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创造和使用了能够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他们的民族自觉性来自历代北方民族被汉族同化、融合,最终走向民族消亡的历史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在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金比辽更加强盛,代金而起的蒙古则更加强大,以至于建立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然而,他们虽然在保存本民族的传统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民族固有的传统中却缺少优秀的文化,在优秀的中国文化面前,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衰败的命运。

对上古社会而言的中世纪社会,以及对中世纪社会而言的近世社会,无一不是对前一个时代的否定。然而,对近世社会而言的最近世(近代)社会,并不是对近世社会的否定,而是近世社会性质加速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单行本中,已经没有论说近代东洋问题的余暇,故止于近世。

接下来收进本《论考》的是《中国古代史概论》、《六朝隋唐的社会》和《东洋的近世》三种。这三种是《东洋的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社会》出版十余年后问世的,可以说是用这十几年间获得的新知对前者的一個补充,观点和立场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史概论》^①中我认为,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起源更加悠久的西亚文化的影响。本书还对欧亚大陆铜、铁两种文明的产生与传播路线进行了图解,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史中的一些问题试着做了解释。

《六朝隋唐的社会》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在本《论考》中

^① 在京都学派和宫崎史学中,“中国古代史”或“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古代”,指中国有史以来至两汉时期的历史与社会。